

转型经济与比较制度分析:论制度范式

孙景宇

摘要: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促使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用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代替所有制分析。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虽然有助于解释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但由于它是从交易关系出发强调个体与法权,这不符合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与此相反,所有制分析更加注重交易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注重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运动,因而对转型经济研究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转型经济 制度范式 改革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

比较研究与分析是转型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所说,“制度范式一个最明显的特征的方法是比较,通过比较一个制度与另一个制度对应的属性,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这可以解释一个制度的某项属性”。在比较的视角中,从东欧、俄罗斯改革理论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转型经济研究的视野逐渐拓宽,理论不断深化,这大大促进了比较制度分析的丰富和发展,为人们认识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然而目前构成比较制度分析基础的有两种不同的制度范式:所有制分析和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毫无疑问,这两种制度范式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从发展趋势上看,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抛弃所有制分析,而采用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本文将通过考察从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到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来对这两种制度范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转型经济研究提供科学的分析工具。

一、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的所有制范式

在科尔奈看来,马克思可以被看作是制度范式的鼻祖,因为他并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而是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观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他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而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论战使得对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得到广泛认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指出,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以经济计算为前提,而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这一切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了起来。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 A. V. 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提出了“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他在1936-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

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试错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

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后来的熊彼特等人都试图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结构和效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加以比较分析,这种制度分析范式为后来的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20世纪6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从而形成了东欧、俄罗斯改革理论,它实际上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论战的继续和深化,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批判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论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他建立了经济系统的一般模型用来对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加以比较,详尽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预算软约束”造成短缺经济的弊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是从经济利益的矛盾运动和动力方面展开所有制分析的,他认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这也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弊端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提出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而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 Brus)和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等人则更强调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他们认为有必要将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分开,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霍尔瓦特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因为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中,虽然布鲁斯较早就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革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主要是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学派也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不会自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们有意识地

进行变革,并且经济方面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必然要触及到社会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导致政治方面的相应变革。但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的研究大多是对两大“主义”存在问题、解决前景和展望以及是否趋同等方面作静态的一般性的比较分析,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持久不变的制度上,基本上没有对新旧体制的变化更替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因此虽然科尔奈等人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但比较的视野仍然只局限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上,其实质就是对两种所有制模式的比较,其制度范式的分析基础仍然是所有制分析。这种比较对象的简单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采取“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提倡的“大爆炸”(Bigbang)式的转型方案,因为既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绝对低效率的,那么转型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采取市场经济模式,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根本没有涉及对现实经济体制变革过程的解释、分析和比较,因而它没能对苏东各国发生剧变之后,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型中的转型纲领、具体目标、路径以及所建立的各种不同的特殊制度安排及其效果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与制度变迁范式

东欧、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实践中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转型不仅仅是像“华盛顿共识”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型,还应该包括更加微小的方面,比如说合同,同时更加注重合同的制定和履行,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个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制度的选择,即确定产权的标准,因此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以保证可能的最大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模式和唯一的方法来实现转型。其实,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有不同的制度的演进道路和方式。

新制度学派突破了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静态的两种“主义”的比较模式,将制度作为一个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内生变量单独拿出来加以研究,从而对制度的基本功能、选择不同制度安排的原因,以及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比较的对象既可以是大的所有制模式,也可以是一项具体的转型制度安排,这就大大开阔了比较的视野,使得比较的对象更加具体化。另外,新制度学派在继承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静态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将转型经济研究的制度范式动态化,产权学派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尤其探讨了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权利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这样比较的对象既可以是同一时间平行存在的制度,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制度,通过对不同形式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来对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加以解释。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占据着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则成为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主流,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研究表明要对传统体制下的所有制进行改革,其实质就是要重新界定产权,通过私有化,让“私人所有权”自然地形成激励机制,从而利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调节机制配置资源,提高经济的效率。在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践中,由于中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方式并取得了明显优于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的改革绩效,这成为进

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重要背景。林毅夫(1994)在对制度的功能、制度不均衡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方式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指出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它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两种,而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杨瑞龙(1998)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假说,并将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移依次划分为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他认为中央政府在改革初期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在政治力量及资源配置权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且中央政府为追求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理论对实行大爆炸和渐进式转型战略的转型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别作了较成功的解释,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对不同转型战略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不同转型方式下制度变迁方式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渐进式转型由于在较长时期内两种体制并存,制度之间不协调较多,完成整个制度变迁需要多次的“谈判”、“签约”,因而转型的交易成本较大,但是渐进式转型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一点点的,而且可以用由于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外部利润”的增加来给予一定的补偿,因而转型受到的反对和抵触也比较小。与此相反,激进式转型由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整个制度变迁过程至少在理论上只需一次“谈判”,因而实施改革的交易成本较小,但由于激进式转型一次性地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而其受到的抵触和反对就大得多,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大得多。

新制度经济学对转型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公司治理问题也作了较好的解释,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转型国家中,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的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因而代理人就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这就要求或者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或者对委托人在外部加以监管。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将公司治理问题引申到政府治理中,用来强调政治监管、法律监管在整个转型国家制度构建问题上的重要性:在钱颖一看来,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无论是在对市场与法治关系的探讨上,还是在评判市场经济的标准上,政府这一角色在研究中都占据着关键地位。政府可以说是在市场与法治相互作用关系中的核心纽带,因此如何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如何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根源。格莱泽和施莱弗(Glaeser and Shleifer)认为,当国家利益与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背离以及规则很容易被破坏时,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制度。奥尔森(Olson)、阿吉翁(Aghion)和罗宾逊(Robinson)以及格莱泽和施莱弗考察了制度选择的政治模型并以此来说明当权者如何保护住自己的职位,从而说明在位的当权者往往通过操纵选举程序、宪法规则、竞选活动和政治党派的经费来源以及其他的制度安排使自己能够继续执政。

三、两种范式的比较研究

从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到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转型经济的比较研究经历了从最初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到对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比较,再到对同一体制下不同的制度功能的比较,比较的视野在逐渐扩大,研究的范围也从原来考察不同经济制度的运行发展到考察各种具

体的制度安排对政治领导人、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保护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解决纠纷、公司治理以及信贷配置等方面的影响。我们发现,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抛弃所有制分析,而采用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毫无疑问,好的理论应该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好的模型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然而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转型经济时,得出的结论越来越倾向于论证制度变迁的方式和结果的多样性,强调不同转型国家走不同的转型道路的合理性,而其理论的综合能力则越来越差,很难得出可以对转型国家的转型实践进行指导的一般性的规律。

人们从“华盛顿共识”给转型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得出的教训就是,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支持,按照凡勃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包括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法律等等,如果能够对这些具体的制度加以概括的话,那么其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一点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平等地建立在法权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取决于一定交易关系上的成本收益分析,产权关系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又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在产权明晰化的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将寻求导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契约安排。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交易需要花费成本,不同的产权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此,交易费用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和选择产权结构的主要根据。可见,新制度主义虽然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并不反对新古典理论,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坦言,他所运用的就是马歇尔发展起来的两种最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因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思考方法和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理论是一致的,都强调理性人、稳定偏好以及最大均衡等等。然而“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一样,都是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的,从而新制度经济学也具有与新古典理论一样的缺陷——没有历史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里被抽象为是自然权利所赋予的平等交易下的法权关系,进而通过引入价格来确定交易成本,把产权制度安排解释为理性的个人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比较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虽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等于众多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个人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阶级、国家和文化对单个的人来说,是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和客观的力量。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是以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不同社会规律性为基础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性关系不过是在生产性关系之上的一种表象。这样看来,对产权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到表面的交易关系上,

而是要深入到交易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事实上产权是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并不能够在法律上一次性界定清楚,这一点已经被转型国家的实践所证明。重视人与人之间交易性关系背后的生产性关系是所有制分析的重要特征,这种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上的不平等正是所有制分析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在东欧、俄罗斯改革理论中,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就是从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差别来分析社会主义劳动内在矛盾,从而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他认为,经济活动的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发展,首先表现为需要的发展,一定的需要形成人们的利益,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决定了经济利益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存在着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差异及其独立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决定着市场机制必然起作用,经济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遗憾的是除锡克外,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派仍然没有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动力系统只是被看做是与决策系统、信息系统等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而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在所有制基础上的不平等,再加上东欧、俄罗斯改革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划分为两个“主义”,从而使得对转型经济研究的制度范式从所有制分析逐渐趋向产权分析。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转型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制度安排的多样性促使制度范式越来越趋向于用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来代替所有制分析,但前者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本文认为,与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不同的是,所有制分析的精髓在于否认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性关系入手,从一定制度安排(所有制结构)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利益关系角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成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问题上,近年来在批判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也具有类似的思想。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物的发展一样,也是一个过程,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其根源来说实际上就是制度的演化过程,而制度本身就是相对的并有着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可见,这种制度变迁演进方式是建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以及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动态基础之上的,它并不认为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一个国家非常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国家也获得成功。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没有适当的制度基础,“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转型经济研究的新的学派——“演进制度”学派,他们更加强调改革的总和的不确定性,即转型没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目标,这场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包含了无数经济代理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而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面对总和的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在总和的不确定性前提下,一切都取决于改革的顺序,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意义是基于第一项改革产生的动力效应所提出的改革顺序问题,正确的改革顺序,应该是先发展可以进一步支(下转第68页)

注释:

参见 Arthur, W. Brian, 1999.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ics". Science, 284, pp. 107-110.

Bennett 和 Farmer (2000) 指出, " (然而效用函数) 在劳动和消费之间不可分的假定是合理的, 有相当多的计量经济检验否定了关于消费的对数效用函数的假定".

20 世纪 70 年代 Brock 把休闲引入效用函数来解释政府行为对就业的影响。

Pelloni 和 Waldmann (1998) 是该模型的极限情况: 他们使用 CES 生产函数, 关于资本是线性的。这时均衡动态可简化为一个状态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 但要求规模报酬高达 1.66。

参见朱勇:《新增长理论》, 172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参见龚六堂、张晏:《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 见《首届全国管理复杂性研讨会论文集》, 196~205 页, 2001。

参考文献:

1. Arrow, Kenneth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pp. 155-173.
2. Barro, Robert 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pp. 103-125.
3. Basu, Susanto and Fernald, John G., 1997. "Returns to Scale in U.S. Production: 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249-283.
4. Benhabib, Jess and Farmer, Roger E. A., 1994. "Indeterminacy and Increasing Retur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3, pp. 19-41.
5. Benhabib, Jess and Farmer, Roger E. A., 1996. "Indeterminacy and Sector-specific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7, pp. 421-443.
6. Benhabib, Jess and Perli, Roberto, 1994. "Uniqueness and Indeterminacy: On the Dynamic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3, pp. 113-142.
7. Bennett, Rosalind L. and Farmer, Roger E., 2000. "Indeterminacy with Non-separable Ut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3, pp. 118-143.
8. Chamley, Christophe, 1993. "Externalities and Dynamics in Models of Learning by Do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4, pp. 583-610.
9. Guo, Jingtang and Harrison, Sharon G., 2001. "Indeterminacy with Capital Utilization and Sector-specific Externalities". Economics Letters, 72, pp. 355-360.

10. Harrison, Sharon G., 1998. "Evidence on the Empirical Plausibility of Externalities and Indeterminacy in a Two-sector Model". Barn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pp. 98-105.
11. Harrison, Sharon G., 2001. "Indeterminacy in a Model with Sector-specific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5, pp. 747-764.
12. Harrison, Sharon G. and Weder, Mark, 2000. "Indeterminacy in a Model with Aggregate and Sector-specific Externalities". Economics Letters, 69, pp. 173-179.
13. Harrison, Sharon G. and Weder, Mark, 2002. "Tracing Externalities as Sources of Indeterminacy".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6, pp. 851-867.
14. Lucas, Robert E., 1988.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pp. 3-22.
15. Meng, Qinglai and Velasco, Andrés, 2002. "Indeterminacy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ith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Mime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6. Mino, Kazuo, 1999. "Non-separable Utility Function 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 in a Model with Human Capital". Economics Letters, 62, pp. 311-317.
17. Mino, Kazuo, 2001. "Indeterminacy and Endogenous Growth with Social Constant Retur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7, pp. 203-222.
18. Pelloni, Alessandra and Waldmann, Robert, 1998. "Stability Properties of a Growth Model". Economics Letters, 61, pp. 55-60.
19.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pp. 1002-1037.
20. Weder, Mark, 2001. "Indeterminacy in the Small Open Economy Ramsey Growth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8, pp. 339-356.
21. Xie, Danyang, 1994. "Divergence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Transitional Dynamics with Multiple 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3, pp. 97-112.
22. Zhang, Junxi,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quilibrium Dyna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4, pp. 227-246.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
(责任编辑: S))

(上接第 64 页) 支持改革的中产阶级, 然后再进行国有部门的改革。如果改革顺序恰当, 在改革当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改革的受益者的利益集团来支持改革; 如果不注意顺序, 一开始就造成许多受害者, 他们就会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政治在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经常是一场动态博弈: 今天做出的决策会影响明天敌对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

正如科尔奈所说的那样: "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 即在一个演化过程中, 历史地形成的制度与其他的、特别是政府当局决定建立的制度之间的差别。"^⑩对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具有影响的力量有两种——路径依赖和制度构建, 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构建、重视法权不同的是, 以"凡勃伦传统"经由旧制度主义和现代制度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演化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的经济学者则更加重视转型经济中的路径依赖, 更加强调经济自身演化的力量, 而这种经济自身自我演化的力量在所有制分析看来, 正是来源于特定制度安排下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运动。

注释:

^⑩雅诺什·科尔奈:《制度范式》, 载《比较》, 2002(1), 第 15~32 页。

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 67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和企业》, 载《比较》, 2002(3), 第 35~53 页。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

变迁》, 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371~418 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化的三阶段论》, 载《经济研究》, 1998(1)。

钱颖一:《政府与法治》, 载《比较》, 2003(5), 第 1~13 页。

参见詹科夫等:《新比较经济学的新视角》, 载《比较》, 2002(4), 第 62~76 页。

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版, 第 2 卷, 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李新、朱富强:《经济改革思维: 东欧俄罗斯经济学》,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2. 景维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 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3.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 中文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 科斯、阿尔钦、诺思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中文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 Hayek, F. A., 199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Kornai, J., 1971. "Anti-Equilibrium", i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 of Researc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7.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Q))